

階級革命者時，「知識階級」便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敵人。當「知識分子」的標籤貼到人們的身上時，他們就變成了「他者」，變成共產主義的威脅。第三章主要關注延安時期，這一時期雖然強調知識分子並不值得信任，但由於他們掌握了知識與各種技能，是實現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，中共因而把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人招募到偏遠的延安，並對他們進行改造。組織和責任的分配產生並再造了社會的邊界，使得這些初來乍到的人們成為特別的群體，思想再教育和群眾監督強化了他們作為下層階級的形象。

第四章闡述了「知識分子」這一分類標籤在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的傳播情況。作者著眼於 1950 年代早期一項登記「無業知識分子」的活動。通過這一活動，官員和普通民眾對知識分子的身分，和如何給相對應的人貼上這一標籤有了深入的理解。當時，不少具有歧視性的招工面向「無業知識分子」，許多在官方看來形跡可疑的人，也被加以註冊。通過這種登記活動，知識分子作為一種不可靠的主體的印象再次得到加深。第五章著重討論了共產革命後，工作場所在「知識分子」被客觀化中所發揮的中心作用。作者以上海的中等教育行業為

中心展開論述，得出的結論是，在各種工作場合上，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主義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分裂和政治上的矛盾。

第六章論述知識分子之於中國共產主義的三種主要觀點：學者將知識分子看做是執政黨潛在的合作夥伴，擁有知識和能力，只是不具備黨員身分；大學生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是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「立法者」，能構築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主義中國；而毛澤東政權則以一個「又紅又專」的知識分子圖像加以反擊。每種觀點都證實了知識分子與政治密不可分。當國家領導人和黨的幹部把知識分子進一步他者化時，產生的緊張和摩擦到達了頂點，並向著更為黑暗的方向發展。第七章用戲劇和電影作品說明 1958 年至 1964 年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的相互作用，知識分子群體不斷成為全國範圍內被攻擊的目標。直至文革爆發，針對知識分子的負面思想和形象充斥了整個中國。第八章是全書總結，作者還談到中國共產主義將知識分子對象化的歷史遺產。相關敘述對於理解 1980 年代後的中國現狀具有啟發作用。（莫澤決，中山大學歷史學系（珠海）大學生）

記憶される西周史

松井嘉德

京都：朋友書店，2019

370 頁，ISBN 978-489-281-177-7

本書是京都女子大學松井嘉德教授的遺作集。該書由松井教授的同門後輩、京都大學吉本道雅教授擔任編者。除吉本先生撰寫的〈著作年譜〉和〈後記〉以外，全書共有論文、書評、史料介紹等 24 篇文章



章。松井先生 1984 年升入博士班，2018 年去世。如果將這 35 年的研究時期分為前期和後期，那麼重要的轉折是《周代國制研究》（東京：汲古書店，2002）一書的出版。該書確是一部有關松井先生前期研究集大成的著作。因此，本文將以松井先生的後期研究為中心展開說明，共有 8 篇論文屬於此期的研究成果：〈周遊之王〉（2003）、〈吳虎鼎銘考釋——探求西周後期宣王朝的實像〉（2004）、〈被記憶的西周史——逯盤銘解讀〉（2005）、〈原始的記憶——銘文和詩篇中的祖考們〉（2008）、〈鳴響的文字——青銅禮器中的銘文與聲音〉（2009）、〈關於西周史的時代區分〉（2011）、〈周王的稱號——王、天子或天王〉（2012）、〈顧命之臣——西周成康之際〉（2016）。

2003 年自陝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逯盤，無疑是松井先生後期研究中最重要史料，也就是說，〈被記憶的西周史——逯盤銘解讀〉是其後期研究中最重要研究成果。對於〈原始的記憶——銘文和詩篇中的祖考們〉以後的成果，正如編者所指出，為「〈被記憶的西周史〉中孕育的種子結出的碩果」（頁 370）。該文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。第一、二章探討逯盤本身的史料性質。為了誇示自己祖先的勳功，逯盤利用了周王的權威。逯盤中記載的逯一族的系譜並非歷史事實，而是在逯個人的權勢背景下，為了誇示一族勳功的「創造的歷史」。在第三章以後，探討了西周史中「康王獨尊」的問題，也就是說，逯盤銘文特別重視康王。「康王獨尊」與西周史研究中聚訟紛紛的所謂「康宮問題」有緊密關聯。根據逯盤銘文中所見有關周王的表述——「王」（夷王）和「刺王」（厲王），松井先生指出，青銅器銘文中所見「康昭宮」、「康穆宮」、「康宮穆大室」和「康刺宮」等康宮諸宮，是昭王、穆王、夷王和厲王的宮殿；也就是說，康王以後歷代周王的宮殿是以康宮的存在為前提。而且，根據青銅器銘文中出現康宮諸宮的時期都

在厲王和宣王時期，松井先生推測，確立康王獨尊的時期一定在厲王和宣王時期。「康王獨尊」的理由是在康王時期開始大規模的征討以及實現支配領域的擴大。最後，「康王獨尊」消滅的原因是周王朝的東遷，因為康宮並不存在於東周首都的洛陽。

〈原始的記憶——銘文和詩篇中的祖考們〉利用青銅器銘文和《毛詩》等材料，論證了在周王朝東遷以後，描述文王以前的古公亶父、王季等詩篇才成立。〈鳴響的文字——青銅禮器中的銘文與聲音〉確認了西周中期以後，青銅器銘文的明顯特徵是記錄周王的命令文句。而且，作為再現確立作者器政治地位的儀禮，松井先生推測該器銘文應該曾被多次朗聲宣讀。〈關於西周史的時代區分〉根據逯盤的銘文，提出西周時代的四期區分法；初周（文王、武王、成王）、盛周（康王、昭王、穆王）、中周（共王、懿王、孝王、夷王）以及晚周（共和、宣王、幽王）。這四期區分法無疑參考了唐代文學研究的時代區分法。〈周王的稱號——王、天子或天王〉當中，圍繞周王稱號的變遷，著重討論了「天王」稱號。〈顧命之臣——西周成康之際〉探討了《尚書》所見作為成王顧命之臣的諸氏族。參考逯盤銘文的內容，因為成王顧命的臣下都是西周晚期權臣的祖先，《尚書》所見成王顧命臣下的故事應成立於晚周時期。

本書編者將戰後至 21 世紀初，日本的商代以及西周史研究分為三世代：第一代的代表性學者是貝塚茂樹和白川靜；第二代的代表性學者是松丸道雄、伊藤道治以及林巳奈夫（考古學家）；而松井先生正可謂第三代學者的領軍人物。

本書為當今商代及西周史研究者提供了日本戰後最新的研究成果，還為該領域的青年學者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出發點。筆者確信，本書將成為今後我們無法繞開、一定要參考的重要研究著作。（野口優，中山大學歷史學系（珠海）副教授）